

# 政治經濟學的定位和發展--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觀點<sup>\*</sup>

黃春興 2004

已刊登於《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十期，2004年9月 PP. 83-119

## 摘要

由於經濟學和人文社會學的發展和雙面夾殺，政治經濟學已無法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圈出專屬的研究範圍，必須發展成和這兩者平行獨立的學門，也就是定位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於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發展歷史是和政治經濟學攜手同步，而其理論嚴謹度與經濟學相同，其關懷議題的寬廣度亦同於人文社會學界，因此本文認為：政治經濟學最有可能發展成獨立之學問體系的道路，是回到奧地利經濟學派再重新出發。本文也從奧地利經濟學派理論角度，分別就全球、中國大陸、台灣三領域指出現今社會所面臨的政治經濟議題，其中屬於台灣的議題是：台灣在民主深化過程中是否有能力發展出一套遊戲規則，有效地限制民主程序的無限權力，以確保經濟運作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擾？

---

<sup>\*</sup> 本文曾在 2003 年成功大學主辦之「政治經濟學學科定位學術研討會」中報告，作者感謝現場發言學者提供的一些見解，尤其是評論人李世榮教授的寶貴意見。

## 第一節 前言

在古典經濟學家眼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相當明確，簡單地說，就是專門研究國家財富的生產、分配、消費。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期，許多著名經濟學者的著作都以「政治經濟學」來命名，譬如 James Steuart(1767)的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Jean B. Say(1803)的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David Ricardo(1817)的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John S. Mill(1848)的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等。約在 1871 年，邊際效用學派革命(marginalists revolution)在經濟學界掀起兩項重大的變革。其一是在價值論上，主觀的邊際效用取代客觀的勞動成本成爲決定商品價值的主要因素；其二是在方法論上，邊際分析法嚴謹的因果邏輯將經濟學帶離傳統的歷史經驗論述，邁入孟格(Carl Menger, 1840-1921)所說的正確科學(exact science)。這兩項變革帶來了擁有 ics 尾巴的「經濟學」(Economics)一詞，也開始困擾以後的(政治)經濟學家：到底政治經濟學只是一位尙未完全退出舞台的老藝人，還是經濟學只不過是一群喜愛標新立異的小頑童？

由於雙方在價值論和方法論上的無法相容，未接受邊際分析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和新興的經濟學家的決裂是必然會發生的。在嚴謹邏輯的誘導下，經濟學者不斷向自然科學靠攏，並在數理工具的輔佐下重構這門「國家財富的生產、分配、消費之研究」的學問。在新興的經濟學搶奪了大部分的學生並逐漸成爲新進學者的新寵後，仍堅守勞動價值理論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者們開始恐慌，急於尋找一處可以完全避開革命浪潮狂野衝擊的港灣。最後，他們選擇要在政治哲學的領域裡尋找一個能擺在港口抵擋巨浪的島嶼，並逐漸吸納人文社會學的內容，發展成一門混合著哲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甚至文學等理論的整合學科。

簡單地說，現今的社會科學同時存在著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人文社會學三個貌合神離的學門。<sup>1</sup>

分裂之後，新興的經濟學者先是發現一片可以隨意翱翔的藍天，不久又發現可以無阻礙地從這片藍天飛抵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地。人文社會學者則因為政治經濟學的靠攏，而獲得一把可以窺探經濟現象與事務之大廳的金鑰匙，並興奮不已地不時去摸索經濟大廳中的各種經濟問題。這兩陣營的學者都試圖侵占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相對地，夾在其間的政治經濟學者卻有完全不同的處境。他們像極了失落田產又不願屈身為佃農的沒落地主，徬徨又茫然，不時發出要求定位的虛弱聲音，一方面希望經濟學者不要過度進逼或期盼他們退還一塊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另一方面則仰望新投靠的人文社會學者能尊重他們的客卿身分。<sup>2</sup>

在我看來，政治經濟學者在定位上的掙扎，就像在聯合國大廈前搖著旗幟吶喊的台灣獨立運動者。他們要求參與聯合國，卻不時飽嚙聯合國現有會員的漠視和冷眼。在這篇文章裡，我要問的是：政治經濟學者是否註定要處於這種尷尬不堪的學術地位？如果政治經濟學的定位態度真的如上一段所述的只求安身立命，那麼，這答案會是肯定的，也是悲哀的。只要我們仔細觀察經濟學自 1960 年代開始朝向社會與政治議題的發展軌跡，就可明白政治經濟學根本無力阻擋經濟學帝國主義式的發展，也不可能從經濟學界中乞討到寸土塊地。<sup>3</sup> 同樣地，人文社會學界既然獲得了進入經濟現象之廳堂的金鑰匙，在面對堆積滿山的財富之

---

<sup>1</sup> 本文區分「社會科學」、「人文社會學」、「社會學」三名詞。社會科學指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在內的所有以社會現象和活動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社會學則只是社會科學的一學科；人文社會學泛指社會科學、哲學、文學等形成的類似整合性計畫。經濟學理應屬於人文社會學，但本文為了便於表達，特將經濟學自人文社會學中獨立出來，並和本文討論的政治經濟學形成「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人文社會學」三個分離的學門。

<sup>2</sup> 中國大陸近年來採行的開放政策也威脅到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地位和生存。由於從西方學成回去的經濟學者大多接受主流經濟學的訓練，不僅各大學紛紛為他們成立西方式的經濟學研究中心，連傳統教授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院也開始轉變，逐漸採用西方經濟學的教材。針對這些威脅，大陸政治經濟學學者們多次集會修訂教材，大幅以分析邏輯取代傳統哲學論述。在內容方面，先是以宏觀調控名稱加進 Keynes 理論，繼而增加 Schumpeter 知識經濟理論的新發展。這些修正明顯地是朝著讓政治經濟學能與經濟學平行而努力。較遺憾地，在不願拋開勞動價值學說的前提下，要結合 Keynes 和 Schumpeter 兩套理論是相當困難的。相關的討論請參閱周冰(2001)和逢錦聚(2002)。

<sup>3</sup> 經濟學的不斷擴充研究領域的現象被諺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請參閱 Radnitzky 和 Bernholz (1987)或劉瑞華(2001)。

前，必然是忙碌於清點這些財貨。在此情境下，投靠而來的政治經濟學者也只有知趣地閃躲到角落。這是真實，也是現實。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現今各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的各系所課程，就能知道政治經濟學的窘境。譬如名稱和政治經濟學接近的社會經濟學，則有屬於社會學系的「經濟社會學」和屬於經濟學系的「社會經濟學」的兩課程。同樣地，「政治人類學」屬於人類學，而「政治社會學」屬於社會學。習慣上，都是以課程名稱的後三字為歸屬學系的研究與教學領域。這雖有畫地自限的嫌疑，卻已是常規。唯獨「政治經濟學」仍妾身不明，不僅經濟學系在開課，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系也都在教授政治經濟學。在這種左右夾殺的處境下，政治經濟學幾乎是不可能找到任何一塊能夠受到尊重的特定研究領域。政治經濟學者若企圖要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圈起一塊地，然後大聲說「這是我的」，一定會被視為瘋子，也無法獲得其他學界的認同。

因此，政治經濟學如果真想找到一塊安身立命之地，這塊地就不能也不會是經濟學與人文社會學搶食下的殘骨碎肉。這塊地必須是整個的社會科學領域。換言之，政治經濟學的「定位問題」，不是在社會科學中畫出一塊專屬的研究領域，而必須是應將自己定位在**整個的**社會科學領域。政治經濟學者必須馳騁在這整個領域的原野上，迎戰來自經濟學與人文社會學的殺伐攻掠。我的意思是：政治經濟學者追求的不應是「在社會科學中尋找一塊地」的定位問題，而應是一套獨立於經濟學與人文社會學之外又能涵蓋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學問體系。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把經濟學界看成是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學派，也把人文社會學界看成第二個學派，政治經濟學也就必須和他們一樣以平行獨立的**第三學派**的姿態出現。當前兩個學派都試圖吞佔整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時，政治經濟學也要堅持吞佔整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雄心，如此才能有生存的機會。<sup>4</sup>

---

<sup>4</sup> 在定位問題上，制度經濟學也有著和政治經濟學類似又不完全相同的問題。由於經濟學各學派都有制度研究的科目，因此制度學派就很容易和各學派下的制度分析混淆。再者，由於制度經濟學傳統上是指源於德國歷史學派的美國制度經濟學，這也使得接受邊際分析的新制度經濟學者不斷強調自己的特色和學術地位。在這方面，劉瑞華(2001)主張新制度經濟學應透過「制度議題」，發展成社會科學各學科的溝通基礎，使各學科的研究得以互補和競爭。這是視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為建立社會科學各學科相互競爭之溝通基礎，不同於本文主張的將政治經濟學發展成可以在社

第三學派的雄心不只是從求生存去思考的政治手段，而是涉及到真正的定位問題。簡單地說，當經濟學和人文社會學分從個人和社會兩角度切入，而逐漸在擴張領域中發生重疊時，我們已無法在社會科學中找到仍尚未探索的處女地。若不從領域著眼，而是從學派的角度思考，就不會有這些困難，因為作為獨立學派的意義不在於研究領域的區隔，而在於方法論的不同。採取從個人或從社會角度去理解經濟現象或社會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只是方法論上的一個面向；另一個面向則是個人看待經濟現象或社會制度所持的態度是主觀性或客觀性。這兩個面向，可以交叉形成四種不同的學派：（個人角度，主觀性）、（社會角度，主觀性）、（個人角度，客觀性）、（社會角度，客觀性）。<sup>5</sup> 若以目前學界現象來說，經濟學界普遍接受（個人角度，客觀性）的方法論，而人文社會學普遍接受社會角度而在主觀性或客觀性上仍有歧見。這兩學界都尚未接受（個人角度，主觀性）的方法論。換言之，如果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能建立在（個人角度，主觀性）上，其所發展的體系便可以 and 另兩學界鼎立為三。

或許有學者認為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已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再朝向嚴峻的理論體系，而是朝向「軟性科學」（soft science）。<sup>6</sup> 以我個人的理解，軟性科學強調的不是不要嚴謹理論，而是強調該學界正處於百花齊放的階段，尚未出現一套涵蓋面廣又嚴謹的理論體系。因此，期待嚴謹理論體系出現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平台（platform），像市場平台一樣地接納不同的商品和廠家，讓不同的理論在這思想市場平台中競爭以成長。其結果如何則無法預見，可能最後出現僅此一家的偉大理論體系，也可成只形成幾點共識的方法論。當然，也可能長期處於零散叫賣的階段。在軟性科學階段，發展嚴格理論是其期待；但

---

會科學領域中與其他學科相互競爭的一門獨立之學問體系。本文的一位評審認為政治經濟學可以走向軟性科學，這倒和劉瑞華對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態度接近。

<sup>5</sup> 當然，有些女性主義者會認為這兩面向還不足以涵蓋政治經濟學學者間的差異，或主張至少還需加入男性立場或女性立場的第三面向。我不反對這種區分，但寧願看成是文中所舉四種學派之學派內的進一步區分。

<sup>6</sup> 當前政治經濟學的表現接近軟性科學的觀點，是一位評審者提出的，也是本文原稿的遺漏。除了感謝外，我設法說明軟性科學應該只是學科的一個發展階段，這階段通常發生在學派的新興時期或是重建時期。

因為無法預知該理論內容，作為平台的學界必須敞開心胸接納不同的理論體系；但在另一方面，參與競爭的各學派和學者則必須嚴謹而不退讓，必須勇於販賣他的商品，拓展其理論的解釋能力和影響力。

政治經濟學除了正處於軟性科學的階段外，也承襲著一些歷史包袱。不可諱言，政治經濟學不是經濟政治學，其研究焦點依舊在於經濟活動與經濟制度，即使靠向人文社會學，依舊必須把持這個研究焦點。當古典政治經濟學者不願追隨新興經濟學的邊際分析革命，而選擇以政治哲學為核心逐漸靠向人文社會學之後，必須面對人文社會學早已發展出來的龐大概念和體系。這情況不同於人文社會學涉入經濟學的傳統領域或經濟學涉入人文社會學的傳統領域，因為這兩學界有其堅固的邏輯體系，可以在原有的體系下緩慢和扎實地去拓展和吸納新的領域。但政治經濟學的處境則非如此。邊際分析革命是因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無法解決「水與鑽石的矛盾」而出現，當前的政治經濟學者若不接納新興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就必須提出不同的解釋。不幸地，分裂的政治經濟學，一方面尚未提出不同的解釋，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對人文社會學的龐大概念和體系，以至於呈現高度的複雜現象。<sup>7</sup>

在這論述下，我們來到一個政治經濟學必須坦然面對的問題：在面對高度的複雜現象下，政治經濟學界是否有這能耐發展成一個可以和經濟學與人文社會學平行獨立的第三學派？我個人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它至少擁有一個長期以來雖

---

<sup>7</sup> 這現象有點類似楊小凱(1992)所提到他在教「中國經濟改革」課程時遭遇的困難，因為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已不再適用，而可用的新理論又尚未出現。不僅在教學上如此，他說：「東歐私有化試驗花樣百出，的確大開了所有改革的人的眼界。」社會主義一旦瓦解，整個的社會主義世界就像一個突然開放的平台，各國各黨都試圖提出一套走向未來的道路。然而，也只有經過各國乏善可陳的種種試驗，人們才逐漸了解改革的方向和問題所在，也才能逐漸發展出經濟轉型的理論。在這過程中，不同的理論就像市場中叫賣的不同商品，包括楊小凱提出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競爭過程中，如何讓新的理論「有效率地」出現？這是奧地利學派的傳統問題，但是，該學派並不使用「有效率」這字，因為我們對於新理論出現的速度和影響的意義都無法評估。如果我們接受熊彼德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明白跟隨市場主流商品而發展的作法反而會妨害市場的發展。由於侷限於新古典理論的「有效率」概念，楊小凱(2001)錯誤地解釋了秩序的意義，過度著重知識的共享而忽略了不同知識的利用和新知識的發現過程。也因此，熟悉奧地利學派的吳惠林（2001）會在該書的序言中說到：「〈經濟學的主流學派與學術秩序〉一文是有回答這些疑問的意圖，但我仍無法苟同」。這是對的，因為這不僅涉及人的行為的數理化問題，也包括知識的發現和利用問題。

遭誤解和忽視卻依然屹立的奧地利經濟學派(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以下簡稱奧地利學派)。<sup>8</sup>我肯定奧地利學派能扮演這個角色，但也不排除其他理論的可能性。如前所述，在一個期待競爭的平台裡，我們必須以開放的心接納不同的理論叫賣者；但是，作為一個叫賣理論的盡責學者，就如同一個企業家，他必須說服消費者相信他的產品最好，他必須是「自賣自誇」的賣瓜老王。在以下的論述中，我將盡力闡述為何奧地利學派是政治經濟學未來發展的不二選擇。但不宜忘記的，市場平台的競爭仍必須是開放的。

簡單地說，奧地利學派和現行居於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派同出於古典政治經濟學，也同時參與了邊際效用學派革命。<sup>9</sup> 由於參與邊際效用學派革命，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和價值論已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然也迥異於人文社會學。但在參與邊際效用革命的學派中，跟隨桀逢士(William S. Jevons, 1835-1882)和瓦拉(Léon Walras, 1834-1910)的經濟學者們過度借助自然科學的分析工具，不自覺地遺忘邊際效用學派革命原本追尋的是主觀價值分析，而在大量利用數學工具中逐漸走向價值的客觀分析，實質上又退回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客觀價值體下，只不過替換了一些分析術語。相對地，奧地利學派則堅守孟格強調主觀價值的分析傳統。這也就是說，當新興的經濟學發展成新古典經濟學之後，奧地利學派無形中在方法論上成了獨立於這新興的經濟學和傳統的人文社會學之外的第三個學派。就本文目的言，如果奧地利學派能提供政治經濟學一條通往獨立學問體系的道路，本文就必須架構出奧地利學派和政治經濟學關聯性。其實，這並不需要特意去架構，我在第二節將簡單地回顧奧地利學派的發展歷史，說明它和政治經濟學互為表裡的同步發展過程。經由對這歷史過程的認識，我們同時也就能了解為何奧地利學派在各時代總是扮演著政治經濟議題的領導者。

既宣稱奧地利學派是當前政治經濟學在尋找出路時的最便捷選擇，本文就必須檢討該學派是否有足夠的能耐發展成一套能涵蓋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體

---

<sup>8</sup> 大陸學界則稱奧國經濟學派。

<sup>9</sup> 由於新古典經濟學居於當今經濟學的主流，在底下的敘述中，我就直接將它簡稱為經濟學。

系。換言之，這潛在的領域不僅以經濟現象為核心，更應廣及人文社會學中所關懷的種種議題。因此，我將在第三節中簡述該學派的方法論和價值論，從它的理論嚴謹度不低於經濟學的論述去說明其能與這兩學門鼎立的能力；接著，在於第四節討論它對於正義、人權、文明的論述，以說明它所探討的議題和人文社會學界一樣地寬廣。基於這些信心，我們在最後一節裡再向前邁開一步，從該學派的觀點去探索這新世紀面對的政治經濟議題和政治經濟學者的新任務。

## 第二節 奧地利學派和政治經濟學同步發展

打從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或之前的大衛休默(David Hume, 1711-1776)，經濟學者就為捍衛市場自由而努力。亞當史密斯為了反駁重商主義而出版《原富》的典範，不必多加重述。對於《原富》又被譯為《國富論》的烏龍，夏道平(1989)提醒我們注意亞當史密斯書名原文中的 *the Wealth of Nations* 的複數國家，因為這是一本探索世界各國一起富裕之原理的著作，不是追逐零和賽局下的富國強兵的兵書。這期待世界各國一起富裕的基本原則，就是將世界看成一個大市場，因為市場是唯一能讓每個參與者都能分享到交易利得，不論分多分少。另外，也只有自由市場才能有效地提供個人自由的生活，因為個人只要持有可交易的商品，就可以在市場中自由地換取個人喜愛的商品。因這緣故，經濟學者一直捍衛著市場自由，抵擋來自政府的種種干預和介入，更反對政府以富國強兵或經濟秩序之名控制市場。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念就是對自由市場的追求和維護。

然而，自由市場是個相當脆弱的制度和理念。雖然人們因它而分享利得，卻習而不察；相反地，以權力奪取利得的方式和效果，則清楚可見。因此，權力也就成為侵犯自由市場的主要來源。在十八世紀，侵犯市場的權力來源有二，其一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政府權力，其二是一般百姓剛從皇權下解放出來的民主權力。

這兩種權力也時常結合，並在擁有領袖魅力的國家元首操控下一起侵犯自由市場。

由於古典政治經濟學興起於英國，十八世紀的英國尚能維持某種程度的自由市場；但在海峽對岸的歐洲大陸，兩股權力卻不時侵犯著自由市場，其一是德國的集權主義，其二是法國的社會主義。當時的德國歷史學派強調國家集體主義的發展，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便是該學派早期的經濟學者。十九世紀末期，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許穆樂(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至今，我們仍不清楚為何被稱為奧地利學派創始人的孟格會於 1883 年展開對許穆樂和德國歷史學派的攻擊，並引爆經濟思想史上有名的「方法論大論戰」(The Methodenstreit)。<sup>10</sup> 由於孟格在論戰中提出諸如主觀主義(subjectivism)和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以及之前參與邊際學派革命時提出的邊際效用，很自然地，因他而發展出來的奧地利學派在本質上便排斥種種的集權主義和總體政策，因為這些主義和政策都必須以客觀主義或方法論集體主義為前提。<sup>11</sup> 論戰後不久，歷史學派也跟著消失；但其門人韋伯(Marx Weber)在反省論戰爭議之後，以其新開創的經濟社會學承接了歷史學派退出後的學術中空地帶。

在奧地利學者眼中，方法論大論戰從未停息，就像宗教裡的善勢力與惡勢力的永恆對決。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歐陸的集體主義化身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身上。龐巴維克(Eugen Bohm-Bawerk, 1851-1914)是第二代奧地利學者，於 1896 年開始批評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資本論》(*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指出剩餘價值理論的錯誤，和馬克思學者Rudolf Hilfreding展開辯論。不久，他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於二十世紀初流傳於美洲大陸，剛好趕在《資本論》傳到之前，讓美洲大陸對馬克思思想產生即時的免疫力。<sup>12</sup> 很有意思地，龐巴維克自己寫的《資本與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 volume III --Further Essays on Capital and Interest*)一書卻塑造出當今經濟學的資本理論。

<sup>10</sup> 參閱 Bostaph(1994)，Hoppe(1995)。

<sup>11</sup> 主觀論方面文獻請參閱 Horwitz(1994)，方法論個人主義方面文獻請參閱 Christiansen (1994)。

<sup>12</sup> 參閱 Rosner(1994)。

米塞斯(Ludwig Mises, 1881-1973)是第三代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在他的時代，社會主義風起雲湧，連英美兩國都廣受影響。1920年，他發表了一篇批判社會主義的文章，指出中央計劃因違背經濟理性而不可能成功。這篇文章引爆了奧地利學派和社會主義修正路線的辯論，尤其是師承新古典經濟學家的Abba Lerner和Oskar Lange。這就是經濟思想史上的「社會主義者之計算」大辯論(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sup>13</sup> Lerner和Lange承認早期社會主義者對經濟的全盤計劃和控制是不可行的，但是他們相信：經由數學規劃、統計調查技術和計算機科技的發展，政府可以採取類似當前中國大陸的「抓大放小」政策，僅控制主要生產因素而放行消費財的生產，便可以做到比市場機制更有效率的資源配置。由於當時蘇聯頭幾期經濟計劃有耀眼的成績，各國紛紛效行，推行各式的計劃經濟或較緩和的經濟計劃，也包括台灣在內。<sup>14</sup> 米塞斯堅稱這些計劃不可行，因為生產因素的價格只存在於市場，但市場無法在計劃下形成。若無市場，就無價格；若無價格，生產因素的配置就會隨意。至於蘇聯的成功，那是因為它的經濟規模還小，即使國內沒有生產因素市場，仍可比照國際市場的價格結構。但如果世界各國都推動計劃經濟，生產因素的國際市場也就隨之消失。不久，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也參加大辯論，堅稱個人知識是資源配置的終極力量，而市場則是唯一能有效利用和開發個人知識的平台。相對地，任何的中央計劃都只能利用到極為少數人的現有知識，更沒有能力開發新的知識。<sup>15</sup> 當時由於新古典經濟學盛行，經濟學者對米塞斯和海耶克的理論並不感興趣。直到蘇聯後幾期的經濟計劃失去光輝，奧地利學派的觀點才開始被重新提起。到東歐解體時，人類才發現奧地利學派理論的正確性，但已為此錯誤付出極慘痛的代價。當前，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已成為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論者在重建社會主義理論時必先克服的關卡。<sup>16</sup>

---

<sup>13</sup> 參閱 Lavoie(1985)，Vaughn(1994)。

<sup>14</sup> 參閱 Hayek(1948)。

<sup>15</sup> 參閱 Hayek(1948)。

<sup>16</sup> 在回顧社會主義者大辯論後，社會主義學者 Bardhan and Roemer (1993)坦承宣稱奧地利學派的

西歐國家在戰後全盤接受了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和其學派的「宏觀調控」理論，相信政府可以利用總體政策將國家經濟管理得很好。雖然凱因斯政策並不像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那般地將政府魔掌直接伸入平常百姓家，但其大有為政府的作為卻也嚴重地限制了自由市場的發展並擾亂了經濟資源的配置。在眾人皆醉之際，依然只見到海耶克及其學術友人對凱因斯理論的嚴厲批判，警告該理論勢必引發嚴重的經濟停滯。<sup>17</sup> 正確的理論未必在政治上就會贏得人們的青睞。從 1960 年到 1970 後期的近二十年間，凱因斯理論橫掃整個自由世界，一直到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出現。<sup>18</sup>

誠如凱因斯所說，思想的勝利在短期間內未必就能產生影響力。在六十年代於北歐興起的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主張，一度藉著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思想的推動和凱因斯政策攜手而行。當凱因斯政策失去政府的信任後，福利國家政策大方地取而代之，推行變相的計劃經濟政策。與其前輩一樣，捍衛自由市場的任務依舊是落到奧地利學者的肩上。Murray N. Rothbard (1926-1995) 和 Israel M. Kirzner 相繼持奧地利學派理論加以駁斥，並提出以自由市場為依歸的奧地利學派式的福利理論。

1990 年之後，東歐的解體宣告了社會主義的徹底失敗，而福利國家層出不窮的弊端和困難也逼著社會民主黨員不得不重新尋找理論出路。從美國的「新民主黨」到英國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我們看到的現象是計劃經濟的思想並未消退，而是紛紛「打著紅旗反紅旗」，設法將經濟計劃的目標暗藏到市場機制裡，要求政府以輔佐市場為名，暗地實現經濟計劃目標。他們提出的策略和口號甚多，從全民健保、BOT 專案計劃、社區總體營造等，到全民入股、社群主義、義工社會等。這些新的策略和口號，就像三十年代的經濟計劃，也像七十年

---

論點都是對的，也指出市場社會主義的發展必須以接受所有的市場機制為前提，包括分權制度、價格競爭、利潤誘因、企業家精神等，甚至也包括 CEO 的巨額薪俸。由於這些改革都必須要以私有產權為前提，市場社會主義者走向私有產權的發展都是有跡可尋的。

<sup>17</sup> 請參閱 Buto (1994)。

<sup>18</sup> 1980 年代的「王蔣經濟大辯論」，其實就是「海耶克對凱因斯大辯論」在台灣的翻版。那時，蔣碩傑便持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嚴厲批判王作榮所接受的凱因斯理論。

代的福利國家，都有著動聽的說法和美麗的理想，也同時隱藏著政府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和對自由的壓縮。同樣地，在當前，我們又見奧地利學者正努力於駁斥這些不時出現的變種社會主義，繼續捍衛市場自由和自由生活。

本節簡略地從歷史過程描述奧地利學派的發展。在這歷史過程中，我們的確看到從孟格到當代的奧地利學者爲了捍衛自由經濟，前仆後繼地對抗各時代變相社會主義的不同形式的計劃經濟，包括了：國家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凱因斯政策、福利國家，直到當代的社群主義和第三條路路線。在人類的歷史上，奧地利學派扮演著自由經濟陣營的主要打擊者和守衛者。不論成功與否，他們對抗計劃經濟的論述和引導對方不斷蛻變的過程，已構成一部完整的政治經濟學史。

### 第三節 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的定位

第一節提到：政治經濟學若要和經濟學與人文社會學鼎足爲三，其理論體系必須要建立在（個人角度，主觀性）的方法論上。在列舉交互的四種方法論後，我們也發現只剩下（個人角度，主觀性）這個組合可以讓政治經濟學發展成獨立的學問體系。在第二節，我們從奧地利學派的歷史發展過程分析它和政治經濟學的關係，也知道兩者之間存在交互成長的共生關係。這樣的歷史發展並不是偶然，而是出於方法論上的相關性。奧地利學派自孟格以來就堅持（個人角度，主觀性）的方法論傳統，而這傳統卻也是政治經濟學尋求獨立的基礎，自然地，兩者也就發展出交互成長的共生關係。

或許會有人質疑這種推論，或質疑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爲何一定得回朔古典經濟學到經濟學分裂與發展，而不是另闢途徑？換言之，政治經濟學既然是

Political Economy，就不必要和作為經濟學一支之Political Economics混在一起。<sup>19</sup> 這種質疑是自然的，但不論如何去另闢途徑，根本的問題仍在於Political Economy多出Political Economics的研究範圍是什麼？布坎南(Buchanan,1984, 1986)在討論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發展時也曾談過這問題。興起於七十年代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一門以經濟學方法探討政治行為的理論，主要有Rochester學派和Virginia 學派兩支派。前一學派是政治學者所發展出來，以William Riker為首，著重於政治行為理論的實證研究，又稱Positive Public Choice 或Positive Politics；後一學派則是經濟學者為主發展，以布坎南和 Gordon Tullock為首，著重於政治制度的探討，又稱為Normative Public Choice 或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布坎南認為：公共選擇理論的發展不論是循前一學派或後一學派都無法令人滿意，因為在既定的憲法規範下，學者們只能無奈地解釋著現存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如果我們想要改善現有的不完善而又不想淪為直覺式的論述，就必須發展出一套跳脫現有憲法規範下的評價標準，也就是他所稱的制憲前的評價標準。由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必須仰賴價格體系來運算，而價格體系又會隨憲法架構而變，故無法作為制憲前的評價標準。他稱一套能作為制憲前的評價標準的學問為「憲法經濟學」，因為這是一套用來選擇憲法的學問體系。憲法經濟學的英文是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不同於公共選擇理論中以經濟學方法研究現行憲法條文的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是在既定的價格體系下研究憲法條文，而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則是研究不同憲法架構下可能出現的價格體系。這區別可以直接投影到 Political Economics 和 Political Economy，因為憲法也是政治領域裡的一環，而在憲政國家裡，憲政更是政治的同義辭。因此，我們便可以這樣定義：Political Economics 是在既定的價格體系下研究政治行為與政治制度的學問，而 Political Economy 則是在廣義的市場平台下研究政治行為與政治制

---

<sup>19</sup> 這是一位評審者的意見。在文獻上，洪鑣德 (1999)也有類似的想法，只不過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應該朝向或併入社會經濟學。從其文義，他所說的政治經濟學是 Political Economy，不是 Political Economics，但其社會經濟學卻是 Social Economics。

度的學問。這裡所稱的「廣義的市場平台」是指所有交換或交易行為所發生的平台。這些交換或交易的媒介未必限於貨幣，而參與者可以在市場平台裡自由進出。

Political Economics和Political Economy的區分，早就存在於米塞斯和海耶克等奧地利學者心中，不過他們的用詞分別是Economics和 Catallactics。<sup>20</sup> 他們認為人既然是傾向於交易或交換的動物，其所交易或交換的對象物就不必限於商品或物品，而可以是行動的交換、限制條件的交換、契約的交換、思想的交換等。Catallactics翻譯為「交換學」，相對地，Economics則只是「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學」。奧地利學者將Political Economics等同於Economics，而視Political Economy就是Catallactics。兩者同樣都是從交易或交換的角度去探討人的行為，差別只在於Economics著重於以貨幣為媒介的行為，而Catallactics不限於以貨幣為媒介。

人的行為也是社會科學的整個範圍。當奧地利學派認為Catallactics探討的就是人的行為，或如米塞斯直接命名他的經濟學原理為《人的行為》(*Human Action*)時，他們是不含糊地視整個的社會科學為其研究領域。然而，不同於人文社會學，奧地利學派切入的觀點是交易或交換，而不是權力、文化、規範等。<sup>21</sup> 從權力、文化、規範等概念切入的是人文社會學，也就是社會科學中不同於奧地利學派的另一學派。

奧地利學派認為從 Economics 到 Catallactics 只是正名而已，並不是研究方法或研究領域的改變。既然人天生具有交易或交換的傾向，就絕不會讓自己的行為受到交易媒介的限制；相反地，人們會尋找也會創造新的交易媒介，而貨幣只是其一。交易或交換都必須從個人的選擇自由和進出平台的自由出發，也因此，奧地利學派在方法論特別強調底下將詳細說明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和主觀論。

論述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和主觀論，必須回溯到亞當史密斯和孟格。從亞當史密斯發表《原富》以來，經濟問題的研究就逐漸成為一門擁有特定研究對象及專業研究社群的學問，但其研究方法與當時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界的論

---

<sup>20</sup> 請參閱 Rowley (1994)。

<sup>21</sup> 這不是說奧地利學派不討論權力、文化、規範等概念，而是他們的分析不以這些概念為起點。相對地，他們認為這些概念所描述的行為或現象，都是人們在交易或交換下的產物。

述方式無太大差異，多採歷史經驗作為論證依據。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該社群討論的主要議題不僅包括市場、貨幣、國際貿易，也討論政府、社會、制度等問題。十九世紀末期，經濟學社群出現邊際學派革命，從本質上改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邊際學派革命的帶領者分別是德語系的孟格、英語系的萊達士和法語系的瓦拉。其中，孟格認為經濟研究若要成為一門名正言順的科學，就必須滿足兩點基本要求：第一、經濟分析在嚴謹程度上必須符合自然科學設定的標準；第二、經濟問題不是將經濟社會看成一個有機體下的問題，而是實存之個人所面臨的問題。<sup>22</sup> 就第一點言，孟格認為歷史經驗的論述方式不僅無法發展出具有普遍性價值的經濟理論，也容易流為學者個人意見的自由表述。若要達到自然科學的嚴謹水準，經濟研究必須提出作為分析前提的公設和建立邏輯推演性格的因果關係，然後再據以展開一套嚴謹的學問體系。就第二點言，孟格指出經濟問題和經濟分析的起點都應該是個人，而不是一個建構出來的社會。

新方法論的提出必須要有一套新的理論來展現，否則是無法說服他人相信那是一套可行的方法論。孟格的新理論就是將商品定義在個人慾求以及個人知道如何去滿足這些慾望的知識上。他以個人慾求為理論前提，提出了邊際效用的概念，去分析一個人是否願意繼續進行同一行動，如商品的消費。在他所舉的例子中，討論到的邊際效用都是可數的商品，像是消費一單位商品之後是否還要繼續下一單位等，而不抽象到微積分層次上可以微細分割的極限概念。這種不輕易從真實世界跳進抽象思考的態度，讓往後的奧地利學派避開在分析中對數學的大量倚賴，也避開了一場方法論上的劫數。既然邊際效用為正和個人會繼續進行相同的下一行動是同義詞，那麼邏輯上就必須假設邊際效用會遞減，否則一個人的行動便無法停止。在奧地利學派裡，邊際效用遞減是邏輯上的假設，並不是來自於對於人的行動的心理學觀察。經濟分析不是歷史經驗，也不是心理分析，雖然有時會使用到相同的術語，就像慾求。邊際效用來自慾求的當下滿足，但在慾求和

---

<sup>22</sup> 孟格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清楚地說到：「人自身是每個經濟社會的起點，也是終點」，因此，「這門科學是關於人們處理他的慾求之能力的理論」。請參閱 Menger(1871/1976)。

當下滿足之間，則存在著個人的認知或知識，孟格稱之為因果關係(causality)。知識或因果關係都存在於個人，而且在各人之間並不相同。因此，即使兩人之間存在相同的慾求，表現在實現滿足和邊際遞減之趨勢等方面也不會相同。換言之，他強調的慾求和知識都是個人性格的內容，也都是只存在於主觀意義下。

如果比較參與邊際學派革命的這三位學者，他們在摒棄歷史論述而改採邏輯分析的作法是一致的，但在強調慾求和知識的主觀意義上卻不太相同。若就改採邏輯分析的成就而論，邊際學派革命算相當成功，因為經濟學發展到二十世紀末，除了只剩下少數的歷史學派、馬克思主義者和經濟社會學的學者仍舊採用歷史論述外，經濟學界普遍上是接受了這種擁有前提假設和嚴謹推演邏輯的方法論。在當代，邊際效用已發展成桀逢士—瓦拉—克拉克 (John B. Clark, 1847-1928) 的新古典經濟學派和在綜合凱因斯理論的新古典—凱因斯綜合學派，其中包括 1970 年代中期發展出來的芝加哥政治經濟學和同年代後期發展出來的公共選擇理論。這些學派和理論由於是建立在桀逢士—瓦拉的架構，傾向於將上述的主觀邊際效用客觀化，採取全面的符號化和數理化的分析模型。也就是，將跨時發生的邊際效用加總成「總效用」的概念，提出效用極大化的數學式行為假設，並在極限意義的邊際分析下對總效用進行全微分計算。於是，經濟學順利地轉型成為科學的一支，或更確切地說是成為自然科學的一支。然而，在這過度模仿自然科學的過程中，他們遺失了讓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的立命核心，也就是失落了孟格所提的第二項基本要求的意義——個人行動的主觀意義。一旦失落這項基本要求，當前的經濟學反而談不上是獨立的科學，因其本質和十九世紀的理論力學無甚大差異。

不同於桀逢士和瓦拉，孟格雖然希望經濟分析能趕上自然科學的嚴謹，卻不認為經濟問題能像自然科學問題那般地簡化成邏輯符號。他知道建構像社會這樣的集體概念，就等於是對真實的人的生活進行符號化過程一樣，因為在符號化之後，就只剩下符號之間的關係，而見不到真實個人的選擇與行動。在真實世界，

每個人都是選擇與行動的主體，而這些人與人之間的種種互動，也就出現交易、協商、議價、交換、合作等社會關係。因此，經濟學者在分析這些社會關係時，就應該從個人如何才願意和他人交往的角度去分析，而不是像集權主義者一樣只想估算那些不存在的社會福利的極大值。在孟格的傳統下。米塞斯從主觀主義去討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希望奧地利學者能用「交換學」(praxeology) 一詞去取代經濟學的慣用稱法。<sup>23</sup>

除了各種的往來關係和交換行動外，個人也會選擇聚居，也會遵守某些風俗與規範，也會和他人一起行動。的確，像聚居這樣的一個「經濟社會」也是真實存在的現象，即使不稱之為實體。這實體並不同於真實的個人。其差別在於真的個人存在慾求，且因慾求而行動；但經濟社會只是個人從觀察中整理出來的概念，它沒有慾求也沒有行動。任何關於它的行為都帶有統計性質，因為那些行為只不過是其參與成員之個人行動的彙總。同樣地，我們也見到其他的「制度」與「組織」，它們也是真實的存在，其本質也和經濟社會一樣。

在孟格提出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下，奧地利學派並不認為這些實體不是真實存在，而是強調其非行動主體，因其無慾求。既無慾求，經濟學者就無法經由因果關係去分析其行動，更無法探究其演化過程。演化是一個連續的動態概念，而不是由一個均衡到另一個均衡的跳躍。就以市場的價格為例，孟格認為它就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實體。價格是相關的交易者相互表現出來的現象，它可能在一小段時間中呈現穩定的均衡，但那只是巧合，因為任一個交易者在實現他的慾求的過程中隨時都會因為個人知識的改變而表現出和以往不同的行動。<sup>24</sup> 海耶克的文化演進學說(cultural evolution)便繼承這方法論個人主義去探討各種社會制度的演化。

---

<sup>23</sup> 在交換學下，米塞斯釐清了個人行動和歷史經驗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個人在行動之前會參考歷史經驗所提供的一些數據。這些數據增加他的資訊，讓他清楚地瞭解他能選擇的範圍，以及行動之後的預期後果；但，這些歷史數據並不能主宰他的選擇與行動。除歷史經驗之外，個人的成長經驗、偏好、可支配資源及周遭條件等，都能影響他的選擇與行動。更重要地，行動是選擇之後的實踐，這還需要決心、意志力、毅力等因素的配合。參閱 Mises(1949)。

<sup>24</sup> 參閱 Menger(1883/1963)，第 192 頁。

## 第四節 正義、人權、與文明

從上節的討論可知，新古典經濟學的定位是擺在有限資源的最適配置的研究。如果是新古典經濟學參與政治經濟學的歷史發展，可以預料地，政治經濟學的辯論焦點也會是有限資源的配置效率，或是從資源的配置效率去評價不同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經濟制度，也就是上節所稱的 Economics。雖然奧地利學派和新古典經濟學派系出同源，但奧地利學派所關心的是 Catallactics，因此利用價格計算的配置效率並不是他們用以評估制度的標準。

在討論奧地利學派的評價標準之前，讓我們再回顧布坎南(Buchanan, 1975)如何評價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布坎南的方法論深受奧地利學派的影響，尤其是其親近主觀主義的態度。簡單地說，他將個人的經濟行為區分成前憲政階段和後憲政階段。在後憲政階段，由於政治和經濟的運作規則已揭示，個人遵循這些規則參與市場並在參與過程中決定商品價格。他認為此時可以價格的邊際變動去計算不同政策的相對經濟效率。但在前憲政階段，社會組成分子必須先進行協商才能決定出政治和經濟的運作規則，因此人們參與的過程並不在於商品價格的決定。此階段下人們面對的問題是制度選擇（或憲法選擇），不是政策選擇。由於制度選擇之前的價格決定模式尚未出現，參與選擇的個人在和他人協商時連主觀性的估價都無法進行，也就無法談論客觀的福利分析。布坎南認為此時個人可以評估不同制度所允許發生之交易機會的多寡，因為這項評估不必計算價格。如果市場制度所允許的交易機會大過政府計劃制度，則前者應是較好的制度，因為每一項交易機會的實現都會創造有利於雙方和全社會的交易利得。

交易機會的擴大，就像是新古典經濟學派所主張的經濟效率，都是一套經濟學家持以評價不同政治經濟制度的標準。但是，人文社會學界則批評經濟學家只知道效率或利得，而不知道人際間的公平、公義、正義（以下合稱公義）問題。

甚至有人認為二十世紀出現的羅斯福新政和福利社會，就是對經濟學最嚴厲的批判。我們不過問這類說法的邏輯，但明顯地，人文社會學界的確嚴厲地指責經濟學迴避了公義問題。經濟學家將如何面對這方面的指責？如果經濟學者認為那些問題本就不是經濟分析的內容，或者回辯說長期的交易利得遠較短期的分配重要，那麼，經濟分析下的政治經濟學將只是 Political Economics 而不是 Political Economy。事實上，新古典學派在這方面是毫無對抗餘地，不是將這方面的議題交給了極具社會主義色彩的 K. J. Arrow 和 A. K. Sen，就是承認「政治經濟學」除了要有經濟分析的面向外，同時還有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的分析面向。這態度等於是將政治經濟學應有的範圍侷限在 Political Economics，而不是 Political Economy。奧地利學派則不是這樣。交換學討論的是 Political Economy 而不是 Political Economics，認為政治經濟分析不能僅觸及交易利得的擴大，也不僅要面對公義問題，更須要對人類文明有明確的分析。

交易利得除了是評價制度的基本判準外，奧地利學者 Kirzner(1989)認為它其實也回答了人文社會學界所提出的公義問題。Kan(1993)根據米塞斯對企業精神的定義，認為交易利得是擁有企業精神的雙方在達成交易合作之後所創造出來的。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企業所創造的交易利得，並以企業家稱呼該企業的經營者，那些交易利得就是企業的利潤，是企業家所創造的。Kirzner 認為利潤分配必須根據古典的財產權植拓法則(homestead)來運作，否則企業家就失去創造交易機會的誘因。沒錯，利潤分配之後是會累積，若分配不平均，則累積之後就形成財富分配不公的社會。但是，分配法則和利潤創造是植拓法則的一體兩面，丟掉這條法則，也就是丟掉利潤的創造；沒有利潤創造行為，也就不會出現交易利得。因此，除了植拓法則之外的其他的分配法則，即使號稱是最公義 John Rawls 的分配法則，由於無法有效誘使企業家進行創造，其要求的分配對象仍將會是毫無交易下的零利得。

除了利得與公義之外，海耶克認為政治經濟學應該考慮到整個人類文明的發

展問題。那麼，什麼是人類文明？而人類文明又是如何形成，如何發展？簡單地說，人類文明可以界定為：人類慾望的不斷開發和不斷降低滿足慾望的成本。於是，政治經濟制度的判準，便在於哪種經濟制度能夠允許人類擁有更高成就的文明，也就是更豐富的慾望和更低的實現方式。如果就市場機制和計劃經濟加以比較，明顯地，市場機制所能開展的人類文明遠非計劃經濟所能望背。<sup>25</sup> 在人類的慾望中，也包括了他人的親切接待。海耶克借用孟德斯鳩的話，說到：「哪兒有商業，哪兒就有親切溫和。」<sup>26</sup> 對自己的父母或子女親切溫和可說是人性，而對自己認識的人親切溫和也不是什麼偉大的德行。真正偉大的德行，是對陌生人持有親切溫和的態度。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未必出於真誠，但是，個人與陌生人的接觸往來就如浮雲偶遇，相互之間需要的是形式上的親切溫和，而不必一定要出於真誠的親切溫和。若比較計劃經濟和市場交易，答案是那麼明顯：只有在市場下的商業競爭才會帶來對陌生人持有親切溫和的態度。

## 第五節 政治經濟學的當前議題

隨著時代的進展，政治經濟的問題不斷推陳出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论也必須跟得上。這一節將分別討論當前全球、中國大陸、台灣三方面所遭遇的政治經濟議題，然後檢視奧地利學派的現有理論，看如何擴充這些理論以跟上新的時代議題。

先就全球的政治經濟環境來說。自從蘇聯解體以後，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已發展成普世價值，而對外往來的開放政策也成時代潮流。幾乎同時，科技的快速發展大幅降低了商品的生產成本和在全球市場流通的成本。所謂的全球化時代，便肇因於制度和技術的雙重突破，使得各地的產品、生產因素、人才、技術、資

---

<sup>25</sup> 參閱 Hayek(1978)。

<sup>26</sup> 參閱 Hayek(1991)。

金能夠迅速地在各國流動。換言之，原本被切割成塊狀的全球經濟，已緊密地結合成一個大市場。在此大市場中，各國的企業激烈地競爭著。然而，過去的政治疆界並未因全球化而改變，各國政府的權力和經濟政策依舊主宰著境內的經濟情勢。在各國之上，也沒有一個能有效執行強制權力的世界政府。於是，各國政策時常衝突，包括美國嚴峻的智慧產權保護政策、歐洲各國對農業和農民的補助政策、中國大陸的外匯金融管制、台灣科學園區盛行的股利分紅制度等。面對這些衝突，我們會自然地問到：在全球化時代，是否需要一套新的交易規則？既然不存在高於國家的強制權力，這套新的規則要如何出現？是否可依賴現行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還是需要各國政府委派代表共同協商？或者是交由市場去處理，讓它在摸索和調適中自然地長出新的交易規則？

由於世界市場已經形成，新商品和新產業很快地就進入完全競爭狀態，而個別企業也很快就達到邊際利潤為零的境地。為了不斷獲取新的獨占利潤，各國政府和各大廠商無不積極從事創新活動，努力尋找知識上的突破。創新活動多了，出現熊彼德所稱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s) 現象的機會也就增加。創造性破壞帶來的社會變革是不連續的。消費者面對每次的變革都需要一段調適的時期。當創造性破壞接連出現之後，個人的調適時期被壓縮，生活風險變得較過去為大。政府和市場將如何因應？

面對這些新的全球性問題，奧地利學派相較於其他學派擁有較多的資源，因為早自米塞斯和海耶克就開始提倡企業家精神、知識經濟學、文化演進學說等與當代議題相關的核心理論，而這些都是新古典經濟學和人文社會學界嚴重缺欠的內容。雖然新世紀的情勢對奧地利學派的進一步發展相當有利，但上述學說畢竟都是在五十、六十年前提出的。那時的世界還見不到共產主義世界的形成和瓦解，也想像不到網際網路和電腦所帶來的科技突破和對社會的衝擊。因此，政治經濟學者當前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如何在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基礎上，繼續將企業家精神、知識經濟學、文化演進學說等理論發展得更為成熟。

其次是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議題。如前述，雖然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已成爲普世價值，但過去的共產國家在追求自由與民主的成效並不理想。相對地，中國大陸雖在經濟改革上取得耀眼的成績，但其自由經濟落實的程度並不高，更遑論幾乎尚未啓動的民主政治。<sup>27</sup>

奧地利學派曾力抗社會主義的發展，積極批判其錯誤。由於當時西方社會基本上仍是自由市場，奧地利學派的任務便在捍衛自由市場和批判社會主義。不幸地，奧地利學派在這場戰鬥中失利，隨後沉寂二十多年。在這段期間，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集權政府，推行中央控制的計劃經濟，直到 1980 年代才瓦解。計劃經濟的失敗讓政治經濟學者重新研究奧地利經濟學說，希望能找到一些重建經濟和社會的理論。遺憾地，在這二十多年的沉寂期間，奧地利學派只傳承捍衛和批判的文獻。他們雖然深信計劃經濟必然失敗，卻未能在這期間發展出一套由集權社會走向自由社會的理論，也就是大陸所稱的制度轉軌理論（或經濟轉型理論）。

雖然奧地利學派未能在計劃經濟瓦解之前發展出制度轉軌理論，但關於轉軌的片斷理論和見解卻是有的。傳承自海耶克的蔣碩傑或許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1950 年代，台灣在蔣介石的統治下也推行計劃經濟。蔣碩傑認爲只有推動自由化和開放政策才能啓動台灣的經濟發展機制。若從新古典經濟學角度，可以說他提出的政策只是鬆綁政策(deregulation)，但若從他所相信的市場會找到出路的觀點和對企業家的信賴上言，說是轉軌政策或許更爲適切。<sup>28</sup> 不過，當時的台灣還處於戰後時期，重建工作尙未完全展開。因此，除了外匯控制外，其他的經濟計劃還多在規劃階段。這和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前所推動的計劃經濟的規模是有天壤之別。

換言之，轉軌經濟學的確是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形成的新議題。中國大陸擺脫計劃經濟的發展並非始自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而可上推到文革時期。費孝通

---

<sup>27</sup> 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之後，似乎也開始感受到政治發展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大會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方向，這是在「經濟文明」之後的新突破，也將會是最近修憲會議的主要方向。

<sup>28</sup> 參閱蔣碩傑(1995)。

(1987)認為最早發生在蘇南的鄉鎮企業，是趁著文革的混亂發展出來的，可以說是民間長成出來的產權制度。由於產權公有一詞存在著寬廣的解釋空間，也就讓中國學者在第一波的討論中把焦點全放在財產權的設計上。由於寇斯(Ronald Coase)和諾思(Douglas North)的適時的先後贏得諾貝爾獎，一時之間，制度轉軌問題幾乎就等於交易成本和制度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應用問題。但隨著經濟的成長和市場的興起，學著們逐漸了解市場所蘊藏的發現機制，更加確信私有產權的不可替代性。逐漸地，海耶克的學說開始受到學界的重視。近年來，楊小凱(2001)便從海耶克的觀點對林毅夫(2002)宣傳的後發優勢論提出警語：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及時調整憲政和制度以讓市場自由運作，中國的經濟不久就會陷入困難。這個爭議自然得由中國的經濟學者去解決。我要說的只是：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興起的轉型經濟學，是奧地利學派早應該發展卻疏忽掉的政治經濟理論。<sup>29</sup>

最後來討論和我們切身相關的台灣政治經濟議題。中國大陸的制度轉軌問題之所以受到全球經濟學界的重視，並不在於中國人多地大，而在於這個百年難得一見的轉軌過程竟能被擠壓在短短的二十年間進行，讓經濟學家可以直接觀察、經歷、參與。當年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不也吸引了全球經濟學界的好奇？那時，由於全球沉迷於凱因斯政策和世界體系思想，在沒人關注下，四小龍採取開放的經濟發展策略只得默默進行。<sup>30</sup> 相對地，開放政策已成現今潮流，全球經濟學界迫不及待地想親睹中國大陸從計劃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的過程，這興奮自然難掩。

其實，台灣當前也正進行著同等重要的政治經濟事件。這事件也值得全球經濟學家的直接觀察、親身經歷。遺憾地，一方面由於台灣的政治經濟學界規模小，另一方面則因學者們忙於參與前述兩大議題的探討，而未能重視這個在歷史意義上不低於中國大陸制度轉軌的政治經濟議題。簡單地說，台灣是四小龍中在經濟發展成熟之後首先邁入民主的國家。民主政治的運作程序並不同於市場機制，

---

<sup>29</sup> 直到近年，奧地利學者才開始注意到經濟轉型的問題，如 Colomatto (2002)。

<sup>30</sup> 參閱蔣碩傑(1995)收錄的〈台灣經濟發展的啓示〉一文。

衝突在所難免。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並未形成類似於南韓的大財團，而是出現一群群的螞蟻雄兵。他們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在經濟範圍內，他們當家作主，安排工人生產，自負盈虧責任；但進入政治民主化之後，他們必須和工人妥協，甚至在政治力量下服從於工人的多數選票。因此，台灣在這民主化過程中，是否有能力確保經濟運作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擾？是否有能力發展出一套遊戲規則有效地限制民主程序的無限權力？如果有幸形成這些規則，其內容是否會同於西方歷史上所發展出來的規則？

回顧西方的政經史，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幾乎是同步發展。因此，他們必須在發展過程中隨時處理兩者的衝突，點點滴滴地累積經驗法則，慢慢地長出能有效協調的遊戲規則。相對地，我們是在經濟發展成熟之後才開始民主化，中國大陸似乎也將會循此路徑發展。在全球化時潮下，其他的低所得國家勢必相續採行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確，台灣今日面對的政治經濟議題，不容我們自己看小，也是一個在歷史意義上不低於制度轉軌的大議題。

2003 年底發生的坪林公投和郝龍斌辭職事件，正可說明上述議題的重要性。從行政院長所說的「專業不能凌駕民主」話中，正透露出我們的社會還未在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中找到協調的規則。如果有了規則，專業不凌駕規則，民主也不能凌駕規則，權力更不能凌駕規則。如果我們無法找到一些規則，民主和民粹在運作上也就會毫無差異。在奧地利學派的政治經濟理論中，民主制度的核心不是票決制度，也不是民主精神，而是能協調雙方合作的規則。發現這樣的規則是當前台灣政治經濟學家必須親自解決的政治經濟議題。

## 參考文獻

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香港：中華書局。1987 年。

洪鎌德，《當代政治經濟學》，台北：揚智出版，1999。

- 周冰，〈理論研究的規範：危機與重建〉，《經濟學動態》，2001年第2期。
- 林毅夫，〈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與楊小凱教授商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2年。
- 劉瑞華，〈新制度主義：返回大理論或經濟學帝國主義政治學？〉，《政治學報》，第32期，2001年。
- 逢錦聚，〈論政治經濟學得繼承和創新〉，《光明日報》，2002年8月27日。
- 蔣碩傑，《蔣碩傑先生學術論文》，遠流出版公司。1995年。
- 吳惠林，〈吳序：還經濟思潮本質的楊小凱〉，《楊小凱經濟論文集》，台北：翰蘆出版社，2001。
- 夏道平，《自由經濟的出路》，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
- 楊小凱，〈鄧小平南巡講話與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前景〉，《信報財經月刊》，1992年7月。亦收於《楊小凱經濟論文集》，台北：翰蘆出版社，2001。
- 楊小凱，〈經濟學的主流學派與學術秩序〉，《楊小凱經濟論文集》，台北：翰蘆出版社，2001。
- 楊小凱，〈後發劣勢〉，《天則雙周》，181講，2001年12月1日。

Bardhan, Pranab and Roemer, John (1993)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staph, Samuel, "The Methodenstreit," in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Peter Boettke, Ed.,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nd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1994: 459-464.

Buchanan, James M.,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Buchanan, James M., "Politics without Romance: A Sketch of Positive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Its Normative Implications,"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Choice II*, ed. by James M. Buchanan and Robert D. Tollis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11-22. 1984.

- Buchanan, James M., "The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 in *Liberty,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6.
- Butos, William N., "The Hayek-Keynes macro debate," in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Peter Boettke, Ed.,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nd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1994: 471-477.
- Christiansen, Gregory B.,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in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Peter Boettke, Ed.,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nd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1994: 11-16.
- Colombatto, Emrico, "Is There an Austrian Approach to Transition?"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002: 61-74.
- Hayek, Friedrich A.,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Hayek, Friedrich A.,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 Hayek, Friedrich A., *The Fatal Conce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Hoppe, Hans-Hermann, *Economic Science and the Austrian Metho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5.
- Horwitz, Steven, "Subjectivism," in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Peter Boettke, Ed.,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nd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1994: 17-22.
- Kan, Steven S., "Entrepreneurship, Transaction Costs, and Subjectivist Economics," *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ulture*, 1(2), 1993: 159-82.
- Kirzner, Israel M., *Discovery, Capitalism,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9.
- Lavoie, D.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enger, Carl.,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F. J. Noc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883/1963.
- Menger, Car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Dingwall and Hoselitz,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871/1976.
- Mises, Ludwig von, *Human Action*, New Po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 Radnitzky, Gerard and Peter Bernholz, *Economic imperialism: the economic approach applied outside the field of economics*, ed.,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1987.
- Rosner, Peter, "The debate between Böhm-Bawerk and Hilferding," in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Peter Boettke, Ed.,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nd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1994: 465-470.
- Rothbard, Murray N.,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Utility and Welfare Economics," in Murray N. Rothbard, *Logic of Action One*, NH: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5: 211-254.
- Rowley, Charles K., "Public Choice Economics," in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Peter Boettke, Ed.,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nd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1994: 285-293.
- Vaughn, Karen I., *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The Migration of a Tradition*,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The Defin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a viewpoint from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Chun-Sin Hwang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Econom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mong Humanit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leave no exclusively studying area for Political Economy. It is so clear that the only surviving way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to claim the whole domain of social sciences as its studying domain.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hist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claim the whole doma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has to be reconstructed from the core of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Based on this school, I propose some contemporary and further political economic issues, including that of searching rules to constrain the unlimited political powers misbelieved in Taiwan during the progress of democracy and to protect the free market.